

技术理性的实证主义根源及困境

——对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深层解读论

李泳梅

提要： 技术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的一种现代模式，是随着人类社会科学和技术迅猛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关于理性的这种现代转型，法兰克福学派几位著名学者曾做过深入研究。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实证主义看作是技术理性的思想根源，并由此出发去深入分析和批判技术理性的现实困境。他们的这个批判视角尚未被人十分重视。而本文就试图对他们这一批判思路进行梳理，并借此寻找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理性 技术理性 实证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

作者李泳梅，女，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系博士生，深圳大学讲师。（广州 510275）

自科学和技术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中初显了它摧枯拉朽的力量以来，每个时代的杰出思想家都会反思科技对人类的影响，其中便有20世纪六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以下简称“法派”）学者提出的技术理性批判思想。目前，我国学界在研究“法派”技术理性批判理论时，通常会将其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韦伯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理论以及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进行比较。但本文认为，“法派”几位代表人物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还有一个特点是值得我们深入关注的，就是他们把技术理性的根源追溯到各种实证主义在理论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泛滥。通过追溯实证主义在技术理性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为我们寻觅技术理性困境的出路提供线索。

一、技术理性的实证主义根源

一般认为，“技术理性”（也称“技术合理性”）的提

法是从马尔库塞开始的，哈贝马斯后来也沿用这个概念，并经常和“技术统治论意识”在同等意义上互换使用。“技术理性”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要用来表征那种在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类的所有理性活动被技术标准所规范和引导的倾向。马尔库塞把这种倾向描述为“以技术为中介，文化、政治和经济融合成一个无所不在的体系，这个体系的生产力和增长潜力稳定了这个社会，并把技术的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①哈贝马斯则描述为“科学与技术的合理形式，即体现在目的理性活动系统中的合理性，正在扩大成为生活方式，成为生活世界的‘历史的同一性’”。^②

理性作为一个哲学反思的中心问题，是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开始的，人类理性的这种现况显然与它在古希腊哲学那里的原初意义不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徒汲取了赫拉克利特和阿那克萨戈拉的思想，把

①（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导论”第7页。

②（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理性既看成是“逻各斯”(λόγος 英译 rational principle),^①也看成是“努斯”(νοῦς, 英译 intuitive reason)。^②这两重意义的结合,使理性的意义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某些内在的张力——它既以客观真理为目标,又以人自身目的为出发;它既要理解客观世界,也要超越客观世界;它既有计算的、逻辑的工具特性,又有基于某些心灵信念的价值特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对技术(τέχνη, 英译 art, 廖申白译技艺, 苗力田译技术)存有戒心,如亚里士多德就把灵魂的理智(διάνοια, 英译 intellect)活动划分为技艺、科学、明智、智慧、努斯五种形式,其中,科学(ἐπιστήμη, 英译 scientific knowledge)是关于永恒事物的思辨的知识;明智(φρόνησις, 英译 practical wisdom)是主宰伦理德性的实践的智慧;智慧(σοφία, 英译 philosophic wisdom)是科学和努斯的结合,是哲学的智慧,是最高的理智形式;而技术,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它具有创制、谋划、运气等品质,因而是靠不住的。^③可见,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人的理性状况已经偏离了古典理性主义对理性的规划。那么,技术是如何取得了它在理性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或者换句话说,理性的现代转型是如何演进的?

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认为,研究理性的这种现代转型,除了要追溯作为经济基础的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这个因素外,还要追溯作为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方面的根源,他们认为,实证主义就是启蒙以来技术理性滋长的思想根源。

马氏和哈氏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是继承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思想。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尽管没有明确使用过“技术理性”这个专用词,但与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几乎同步,他在20世纪30年代也就科学危机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著名论文。他的批判理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自始至终都坚持在方法论上严厉批驳实证主义,并由此出发去探讨科学问题。他的观点得到阿多诺的支持。他们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在展开技术理性批判时,都把实证主义看成是技术理性

生成的思想根源。因此,要对技术理性的思想根源有更深认识,必须从理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实证主义的思想开始。

实证主义指源于实证科学的一种哲学体系。孔德把它看成是人类理性经过了神学和形而上学两阶段后的最高阶段,“是唯一完全正常的阶段,人类理性的定型体制的各个方面均寓于此阶段之中。”^④孔德之后,又由20世纪20、30年代奥地利“维也纳学派”发展出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等新流派。霍克海默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它对思想领域——尤其是理论研究——所造成的危害上。《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是他为“法派”批判理论奠基的名篇,该文开首便批判了作为逻辑实证主义奠基者之一的彭加勒等人对理论的传统阐释。^⑤霍氏指出,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理论有一种思维,这种思维的总目标是建立一门不局限于特定的主题、包含一切可能对象的普遍的系统科学,可从相同的基本原则推出特殊领域的原理从而打破学科的分隔。依照这种思维,人们会倾向于建立一个纯数学的符号系统,即把理论提升至普遍范畴和永恒的“逻各斯”的高度。这样,实证主义就把科学的“逻各斯”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把本来作为理性活动始因的、代表人的心灵的“努斯”摒弃了。由此,人的目的性就在人的理性活动中被遮蔽了。在《启蒙辩证法》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继续抨击这种实证主义思维,认为它造成了启蒙理性的倒退。他们指出,这种实证主义的启蒙理性是一种同一性的思维方式。

这种实证主义同一性思维在思想领域造成的第一个潜在危险就是,会导致人们逐渐趋向一种肯定性的思维。实证主义认为,人只可能认识那些在经验中被给予的东西。霍氏指出,如果按照实证主义的原则去建构理论,那么理论便会抛弃了它原所应有的反思和否定的传统,并且只要在现实中找到了支持的证据,则理论就能得到确证。按照古典理性主义的观点,理性中的科学的“逻各斯”是以永恒的普遍规律为对象的,

① 凡标有“英译”的名词,其译法均来自 William David Ross。参见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lated by William David Ros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08.

② 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意指人对自然变化的客观规律的把握,是可以数学的方法来计算或推理的;而阿那克萨戈拉则试图找出宇宙万物的动因,他把其归之为“努斯”,即心灵,它是无限的、自动的、能知的,它与万物相对立,但万物因它而动。参见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7—238页。

③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65—190页。

④ (法)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页。

⑤ 这种“对理论的传统阐释”,其概貌可由逻辑实证主义创始人石里克描述得见:“特殊的定律是一系列单一观察的结果,一个普遍的定律是以同样的方式归纳合并不同的个别定律的结果。直到最后,我们得到了相对说来较少的普遍命题,这些普遍命题包括了全体自然律。……从命题系统中选出一组最普遍的命题,所有其它命题均可由这组命题导出。”参见(德)莫里茨·石里克:《自然哲学》,陈维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1—22页。霍氏认为这种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路径蕴含着等级制的逻辑。

当理性被强调这种品质时,它必然还具有否定现实的品质,但是霍氏已警觉到,实证主义终将会使技术的“逻各斯”僭越了科学的“逻各斯”,使理性失去否定的品质,从而,一切理性活动以现实为依归。

此外,在霍克海默看来,实证主义同一性思维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企图把事实与价值相分离,这也是它在思想领域的第二个潜在危险。实证主义期求找到一切事物共有的普遍性规律,这是一种排除价值因素于事实判断之外的方法论主张。霍氏则认为,理论不可能具备普遍意义,理论只能放在现实社会的背景中来理解,“科学工作的范围和方向的确定不仅由其自身的趋向来决定,而且最终是由社会生活的必然性来决定”。^①同时,他还认为,认知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认知主体本身的观念和认知工具(如语言符号)的历史先在性,也决定了认知事实不可能具备纯粹意义上的客观性。阿多诺在与波普的论战中进一步指出,实证主义所主张的价值中立实质上就是一种价值,而并非“无价值”,实证主义所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社会现象本身就是经过了中介的现象。^②所以,实证主义力图把事实与价值相分离,其结果只能是构造出“普遍有效性”的幻象,而这将进一步强化科学的历史局限性,从而失去超越自身和超越历史的可能。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通过批判实证主义对理论(主要是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造成的不良影响,来揭示实证主义给人的理性思维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在他们的层层剖析下,我们看到,实证主义通过那种同一性的思维方式,把理性一步步引向了“逻各斯”至上的模式,而技术理性的困境也渐现端倪了。

二、技术理性的实证主义困境

这里所说的技术理性困境,是指以实证主义为思想根源的技术理性在实践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困境。正如霍克海默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中所指出的,光是批判那种有问题的理性思维模式是不够的,“对科学的危机理解有赖于某种关于当前社会状况的正确理论;因为,作为一种社会功能,科学反映着当前的社会矛盾”,^③也就是说,更为重要的是,要把这种理性问题放在现实社会关系中来考察,研究它与现实生活之间

的相互作用。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合作的《启蒙辩证法》就着力揭示实证主义同一性思维对社会关系的危害。他们认为,这种思维孕育了统治,“对个体而言,统治表现为普遍性,即现实中的理性”。^④这种统治首先表现在货币的普遍的中介性上。启蒙理性虽然消除了旧的等级制度,但其同一性的思维方式却与具有普遍中介性质的货币一拍即合,使货币成为新的主宰,从而使不平等以新的形式永存。其次,统治也表现在技术对人的剥削上。实证主义思维是一种计算的、效率的思维,它使技术成为知识的本质,其“目的不再是概念和图景,也不是偶然的认识,而是方法,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以及资本”。^⑤最后,统治还表现在科层制上。虽然韦伯认为现代科层制(也译官僚体制)具有“规则、目的、手段和‘求实的’非人格性控制着它的行为”的理性特质。^⑥是理性化的重要方面和值得肯定的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但霍氏和阿氏却认为,科层制的那种理性特质正是体现了实证主义的思维原则,个人培养这种思维的过程,也就是学会遵守现行秩序和接受从属地位的过程,最终,管理思想与真理将被等同起来,统治因而得以实施。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分析和批判,影响了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但马、哈二人的技术理性批判更为针对后工业时代的西方社会,他们在这方面的论著和论文基本上都是发表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此时,技术活动在组织化程度、规模化程度及其对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与30、40年代霍、阿猛烈批判实证主义的时期相比,已有很大的发展。因此,同是对实证主义进行批判,马氏和哈氏的理论重点放在了突出技术的统治性或统治功能上。

马尔库塞主要沿着霍、阿二人批判肯定性思维这条思路走,以重新倡导黑格尔的辩证理性为解决的出路。他认为,实证主义拒斥一切不具有“实证”意义的概念,使理性屈从于满足确定的事实,拒绝任何对事实的超越和对现实存在关系的偏离,“哲学的思想变成了证明性的思想”。^⑦如果实证思想占主导地位,那么社会就一定成了单向度的人的社会,即人们丧失了批判的维度,使知性僭越了理性,辩证理性便退化成为技术

①③ (德)霍克海默:《霍克海默集》,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第162-163、163页。

② 王晓升:《阿多诺对于实证主义社会理论的三个基本命题的批判》,《江海学刊》2005年第3期。

④⑤(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2页。

⑥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24页。

⑦ (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146页。

理性。在马氏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里,他对技术本身的态度是矛盾的,时而认为技术是政治中立的,时而又认为技术本身就是统治,当然,他大体上还是倾向于后者。他曾说,“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①他认为,由于实证科学的方法论主张科学假说可以通过经验证据得到证实,因而,只要限定了实验条件,则取证就并非难事。根据这样的方法论原理,统治集团便可先行刺激大众对物质的虚假需求,强化大众的物化意识,在此前提条件下,再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来增加物质生产成就,最终证实并确保其统治的合法性地位。这样,实证科学的方法本身便内含了统治的逻辑,而统治又是通过科学的技术化得以实现的。

哈贝马斯则沿着霍克海默批判实证主义意图分离事实和价值的路子,来分析实证主义是如何形成技术理性倾向的。他认为,技术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成就是不能否定的,他针对那些主张为了保护自然而放弃技术发展的观点说,“无论如何,技术的成就(这些成就本身是不能抛弃的)肯定不能用自然界(它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来代替。”^②因而,他反对马尔库塞认为技术本身就是统治的观点,指出技术本身不是统治,它是被统治集团利用成为统治的工具,即技术被当作了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而在这个过程中,实证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哈氏对这个过程的分析是从区分“劳动(即目的理性的活动)”和“相互作用”两个范畴开始的。他把“劳动”理解为工具活动和合理选择的结合,把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活动。在劳动的构成中,工具活动是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的,而合理选择则是按照以分析知识为基础的战略来进行的,显然,这两者都以经验知识为基础,并通过某种特定的准则来演绎、预测结果,即劳动遵循实证科学的方法论原则。而主体间的相互作用,主要表现为以语言符号为中介的交往,它们是按照主体必须遵守的规范来进行的,这些规范要得到两个以上的行动主体的理解和承认,内含了某些共同的价值标准。由于统治和意识形态是在交往条件下形成的,因而对统治和意识形态的反思也只能在对交往活动的观察中产生。但是,“普通的实证论思想使日常语言的相互作用的坐标系失去作用。”^③这是因为实证论思想总是试图分离事实和价值,是一种计算的、逻辑的思维,当其运用到社会活动领域时,就只注重劳

动效率的事实评价,而忽略交往活动的价值评价,于是,在“非价值判断化”的标题下,当某种统治和意识形态能够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时,便产生了如下后果:一方面,把内含着价值判断的交往领域给忽略掉了,使得统治和意识形态的真实面貌越来越难以得到省察,造就了人民大众的非政治化;另一方面,也使得交往活动的规范越来越服从于目的理性活动的结构,原本应是内心化、价值化的交往规范被外在控制性的、技术化的行为模式所取代。这样,技术及其所依赖的科学,便以它们对劳动效率和由之产生的物质成就的贡献,使得劳动领域和交往活动领域均被技术的规则所控制,将整个社会变为了一个技术理性的社会。哈贝马斯认为,这种技术理性是隐形的意识形态,可以使统治的合法性力量得到发展,解决的出路是建构一种对话、理解、互动的交往理性。

三、实证主义批判的启示:寻找技术理性困境的出路

如果要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技术理性的思想串连起来,那么,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就是那根思想的红线。尽管他们的侧重点不一,所寻找的出路也不同,但是在实证主义是技术理性的思想根源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通过他们的层层剖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实证主义是如何形成技术理性现实困境的。首先,实证主义以它的同一性思维方式强迫理性迎合现实,把否定的维度抽去,变成了单向度的肯定性思维;再而,实证主义同一性思维又把事实与价值相分离,使理性的价值维度失去了作用;最后,实证主义那注重计算、追求实效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技术的思维,它与技术的发展相互促进。这样,实证主义便在思维领域里做好了一切准备,使技术理性呼之欲出了。

“法派”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对实证主义的剖析和批判,首先给我们带来方法论上的启示。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根据他的思想可得出如下结论:技术理性作为一种意识形式,其生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物质生产方式的因素。在这个方面,“法派”的批判理论并没有否定马克思,比如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把理论的视阈设定在发达工业社会上就是明证。但是,他们的重点在于,要从社会意识领域中去寻找技术理性滋长的思想根源。这样做的根本原因有二。首先,他们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里,技术和科学已成为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并创造出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而资

①②③ 引自(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40、45、70页。

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具有确保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自我推进机制,这样一来,马克思所主张的那种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难以成为变革的真正动力了。而社会的现状却不是不需要变革的,因为统治依然存在,只不过换成了更为隐蔽的方式,而统治的关系不但表现在人对人的统治,还有物对人的统治。既然在物质生产领域上找不到出路,那么就需要在社会意识领域中寻找出路。其次,“法派”的学者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里,物对人的统治是最为突出的统治,甚至人对人的统治也是由此而产生。这个观点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异曲同工,只不过马克思把统治归因为异化劳动,而他们却更倾向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认为在发达商品社会里,物化意识才是通向现实统治的桥梁。同时,他们也赞成卢卡奇的解决方案,就是试图通过对意识领域进行变革来寻找出路。在这两种理论背景之下,他们对技术理性进行意识领域上的探源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姑勿论他们通过这种探索所得的结论是否正确,但是,通过对一种意识的思想探源来分析和批判这种意识形式,这种努力本身就不应该被否定,尤其是当社会存在基础(主要是指物质生产方式)的矛盾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时,这种努力就显得更为重要。“技术上有用的知识的传播不能代替反思的巨大力量。”^①反思的过程就是对思想进行思想的过程,是价值维度重建的第一步。由于人对事物价值的判断总是根植于某种价值观,而价值观又属于人的思想范畴,因此,人惟有先具有了反思的意识,才有可能省察到价值维度的失落或价值的错位,继而才有了批判现实和超越现实的原驱力。而这正是“法派”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启示。

“法派”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第二个启示就是,理性应该寻回它在古典理性主义中的那种原初意义。从启蒙运动起,先是人类探索自然的热情使科学的“逻各斯”占据了理性的主导地位,再而是改造自然的成果又使技术的“逻各斯”最终占据了上风。但结果都一样,就是冷冰冰的“普遍规律”越来越主宰着人的世界,而那代表人类心灵的“努斯”却渐渐隐去了身影。可是,没有了“努斯”的理性还是“属人”的理性吗,或者说,它还是理性吗?“逻各斯”只是理性的原则或作为理性对象的“永恒事物”,它本身并不是理性的全部或

就是理性的自身。^②离开了“努斯”,“逻各斯”就成了“非人”的实体,这种实体不是神就是物。如果是这样,“逻各斯”就走向了自我的悖论——原本是“属人”的,后来却成了“非人”的。而更甚的是,当我们把“逻各斯”抬到独一无二的至高地位时,它就成了压迫我们自己的异己之物。启蒙以来,物的统治就是这样形成的。可是,理性在计算、实效的工具维度之外,还应有信仰的、美感的、伦理的价值维度,这些都是“属人”的东西,没有了这些东西,人是没有精神家园的人,社会是冰冷无情的社会。因此,我们惟有重拾古希腊先哲的智慧,让“努斯”和“逻各斯”再度携手,去成就完满的理性,从而给信仰和美感留下地盘,以让心灵满足;使伦理德性成为实践指南,以构建社会和谐。

第三,“法派”技术理性批判理论还启发我们去思考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存在的精神领域上的问题。首先就是价值维度的重建问题。无可否认,在目前的中国,信仰、伦理等价值领域的问题日益严重,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人们越来越重视物质的追求,而缺乏精神的充实,这种“惟物质”的价值观是危险的,它使金钱逐渐成为一切事物的衡量标准,并最终导致各种社会关系金钱化,腐败问题、人情淡漠、贫富差异日益扩大等社会弊端都可从中找到答案。因此,重建价值信仰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它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關鍵,也是中国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其次,还有科学理性的构建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科学技术在国人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可事实上,中国人科学理性水平总体来说还是偏低的,从伪科学一度盛行的事实就可得到说明。因此,我们要注意区分技术理性和科学理性,当我们在批判技术理性的同时,却必须要提倡科学理性。这种科学理性是否定精神和实证精神的相结合,它可使我们在小心求证的同时,还坚持那种反思、怀疑的否定精神,不会轻易陷入轻信、盲从的境地,并把追寻真理、创新科学作为更高目标。而有了这样一种否定性的思维,也有助于我们时时反省我们的内心世界,这也是通向价值重建的第一步。

责任编辑:任宜敏

① (德)哈贝马斯:《理性与实践》,郭官义、李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80页。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8页。